

中國歷史文集叢刊

〔新羅〕崔致遠 撰

桂苑筆耕集校注

上

中華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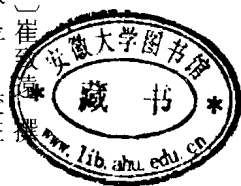
中國歷史文集叢刊

桂苑筆耕集校注

上

〔新羅〕崔
党銀平校注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桂苑筆耕集校注/(新羅)崔致遠撰;党銀平校注. -北京:中華書局,2007
(中國歷史文集叢刊)
ISBN 978-7-101-05321-0

I. 桂… II. ①崔…②党… III. 古典文學-作品集-中國-唐代 IV. I214.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6)第 115651 號

本書的撰寫曾得到全國高校古籍整理委員會的直接資助,
謹此致謝!

責任編輯:于 濤

中國歷史文集叢刊
桂苑筆耕集校注
(全二冊)

[新羅]崔致遠 撰
党銀平 校注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27½印張·4 插頁·400 千字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3000 冊 定價:56.00 元

ISBN 978-7-101-05321-0

序

郁賢皓

桂苑筆耕集是唐末新羅文人崔致遠的詩文別集。崔致遠，字海夫，號孤雲，新羅王京（今韓國廣尚北道慶州）人。他於唐懿宗咸通九年（八六八）十二歲時渡海入唐，唐僖宗乾符元年（八七四）進士及第，歷任溧水尉、淮南節度使幕府都統巡官，直到唐僖宗中和四年（八八四）歸國，留唐達十六年之久。他對中國文化有很深的造詣，韓國學界尊崇他爲「漢詩學宗師」、「東國儒宗」，非常重視他在韓國文學史、思想史及中韓關係史上的重要作用，桂苑筆耕集二十卷是崔致遠歸國後自編的文集，是韓國現存最古、最完整的漢文典籍之一，也是朝鮮三國（高句麗、百濟、新羅）時代唯一傳世的個人別集，有「東方文章之本始」和「東方藝苑之本始」之譽。該集的內容收錄了崔致遠在淮南節度使高駢幕府四年間所作的公私文翰與詩作，其中記錄了唐末不少歷史事件及歷史人物，保存了許多我國正史失載的原始材料，是研究晚唐歷史和晚唐文學珍貴的第一手資料。但原集自光啓二年（八八六）

編成後，流傳不廣，朝鮮純祖三十四年（一八三四）徐有榘聚珍活字本出，才得以一綫相傳。中國雖然有清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廣東番禺潘仕成海山仙館叢書本及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傳世，但文字上仍有不少脫、訛、衍、異之處。對於這樣一部具有很高歷史文獻價值的桂苑筆耕集，中國學術界歷來很少有人研究，至今尚無校注本問世。現在，黨銀平博士的桂苑筆耕集校注在中華書局出版，填補了學術研究領域中的一個重要空白點。

銀平君在南京大學中文系師從周勛初、莫礪鋒教授攻讀博士學位時，就以崔致遠作為研究課題，一九九九年獲得博士學位後，進入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博士後流動站，鄙人作為他的聯繫導師，鼓勵他繼續研究本課題，並與韓國學術界交流。二〇〇一年出站後留在南京師大文學院工作，邊教學邊研究，又多年沉潛於此，勤勉不渝，現已積累了豐富的資料並取得很多研究成果，本書便是他同類研究中長年積累的佳作。本書體例由繫年、校勘、注釋三部分構成，內容充實，言之有據，充分體現出作者嚴謹踏實、實事求是的治學態度，並在學養方面很見功力。本書的長處主要表現在：

第一，繫年都有切實可信的客觀依據。原集除少量詩文有明確可考的寫作時間外，大部分篇什的作年都難以確定，本書則依據正史及相關材料予以考訂，如卷一賀建王除魏博表，即根據新唐書卷九僖宗本紀的記載，考明僖宗之子震在中和元年封建王，除授魏博鎮使則在中和三年，由此證明此表撰於中和三年。卷七史館蕭遘相公的作年，本書據嚴耕望唐僕尚丞郎表卷二〇禮部員外郎「補遺」考訂蕭遘以禮部尚書兼任史館監修時在中和元年至二年，遂確定此封別紙當撰於中和二年前後。又卷十一答江西王尚書書有「況值前廉已去，新帥未來」語，本書據唐方鎮年表卷五謂「前廉」爲前宣歙觀察使裴虔餘，其人於廣明元年十一月任宣歙觀察使，翌年（中和元年）罷任，證知此文當撰於中和元年或稍後。對於那些無法遽定時間的詩文，本書也根據內容作出較爲合理的推測，對於缺乏資料目前尚難考知的作品，則暫不繫年，表示無徵不信。

第二，校補謹慎。本書以朝鮮徐有渠活字本爲底本，又與海山仙館叢書本、四部叢刊本及韓國有關選本相參校，補闕糾訛，擇善而從，盡力還原是集的原貌，這給讀者和研究者都提供了許多便利。如有異文，只注明歧異，不隨意妄改，體現出作者對文獻整理的科學

態度和較高的整理水準。

第三，注釋精細準確。原集收錄文字多爲幕府文牘，涉及到繁多的職官、制度、人物及各類名物，注釋有一定的難度，但本書能遍稽典籍，準確注明事典的出處與人物的本事。注釋中還注意利用地下發掘的貞石資料，如原集卷三謝詔獎飾進奉狀提及唐末淮南「供軍應接使駱潛」，事迹不詳，本書據一九六六年揚州出土的唐薛瞻所撰唐淮南進奉使檢校尚書工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會稽駱潛墓誌銘，考知駱潛字晦中，由弘文館校書郎徐州供軍使判官，授衛尉寺主簿，又任成都府靈池縣令，轉入淮南後加侍御史內供奉賜緋魚袋，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中和初年加檢校尚書工部郎中，度支淮南軍前糧料應接使，年三十七因病亡於通州，光啓元年八月八日殯於揚州揚子縣江濱鄉風亭里，這就使其人行迹大爲顯明，足補文獻之闕。

第四，注意吸取新的學術觀點和研究成果。如原集卷十六求化修大雲寺疏所言揚州大雲寺已毀於兵火，不明所在。本書則據宋贊寧宋高僧傳卷十四唐揚州大雲寺鑒真傳，韋旭升致遠居唐宦途時期足迹考述（外國文學研究一九九九年第三期），耿鑒庭從揚州的

南宋城磚磚窯談到唐代大雲寺的寺址（文物一九六三年第九期），白化文、李鼎霞、許德楠校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一等資料，簡述了大雲寺的沿革及寺址，這對了解原文有很大幫助。

此外，本書在「前言」中清楚地梳理了原集的成書、流傳經過及版本系統，還附入了作者所撰崔致遠桂苑筆耕集的文獻價值一文，說明是集的重要史料價值，對讀者有很重要的啓示。

總之，銀平君的這部著作是他多年勤奮治學的結晶，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它的出版，定當在中韓兩國學術界產生重大影響，故樂而爲之序。

二〇〇六年二月於南京寓所

前言

桂苑筆耕集二十卷是唐末新羅文人崔致遠歸國後於光啓二年（八八六）正月自編的詩文別集，集中收錄了他遊宦淮南幕府四年期間的表狀書啓及詩文之作，文風淵雅瞻麗，是韓國現存最古的漢文典籍之一，也是朝鮮三國時代唯一傳世的個人著作，因而被該國學者譽爲「東方文章之本始」和「東方藝苑之本始」（朝鮮洪奭周、徐有渠校印桂苑筆耕集序，載韓國成大慶編崔文昌侯全集，成均館大學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第二八五頁、第二八六頁）。此集翔實地記錄了唐末很多重大歷史事件及重要歷史人物，從不同角度展示了唐末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圖景，蘊含了許多我國正史失載或語焉不詳的原始史料，具有豐富而珍貴的文獻價值，清代以研經博物聞名東南的朱緒曾對該集的史料價值頗爲推重（見開益齋讀書志卷五別集，中華書局一九九三年版，第七三頁），陳寅恪先生在韋莊秦婦吟校箋中也盛讚：「崔致遠桂苑筆耕代高駢所作書牒，關於汴路區域徐州時溥泗州于濤之兵爭

及運道阻塞之記載甚多，俱兩唐書及通鑑等所未詳，實為最佳之史料。」（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第一八頁）但此集長期以來在中韓兩國皆罕見流傳，最早著錄該集的是新唐書卷六〇藝文志：「崔致遠四六一卷，又桂苑筆耕二十卷。」高麗金富軾三國史記卷四六崔氏本傳便據此記載，東國通鑑及東史纂要等史籍則不見著錄。我國自南宋至清道光間此集亦鮮見流傳，全唐詩與全唐文皆未收錄崔氏詩文，四庫全書總目與崇文總目等書目亦闕載。儘管如此，桂苑筆耕集以其文筆之優美與史料之可貴而受到人們的重視，後世曾屢次鈐印傳抄，使之得以流傳並擴大影響。

一、桂苑筆耕集的成書經過

崔致遠於唐懿宗咸通九年（八六八，新羅景文王八年）十二歲時渡海入唐，唐僖宗中和四年（八八四，新羅憲康王十年）二十八歲時充國信使離唐東歸，留唐時期主要經歷了長安求學、洛陽漫遊、溧水為尉及入幕淮南四個時期。留唐十六年間，他懸刺求學，筆耕不輟，創作了大量的漢文詩賦與文章，對漢文漢詩的造詣頗深。光啓元年（八八五，新羅憲康王

十一年）春三月返歸故國後，他便着手整理彙編留唐時期的詩文作品。據桂苑筆耕序介紹，他在長安「觀光六年」期間，「此時諷詠情性，寓物名篇，曰賦曰詩，幾溢箱篋」，但這些詩賦被他後來以「童子篆刻，壯夫所慚」爲由而廢棄；乾符元年（八七四）進士及第後，「尋以浪迹東都，筆作飯囊，遂有賦五首、詩一百首、雜詩賦三十首，共成三篇」；調授宣州溧水縣尉期間，「仕優則學，免擲寸陰，公私所爲，有集五卷」，因溧水「地號中山」，遂將其編爲中山覆簣集；從職淮南幕府時期，其創作尤爲豐富。這次整理結集便主要以洛陽、溧水、淮南三個階段的詩文作品爲主。

崔氏在光啓二年（八八六）所作桂苑筆耕序中曾自述編集的經過與初衷：

及罷微秩，從職淮南，蒙高侍中專委筆硯，軍書輻至，竭力抵當，四年用心，萬有餘首。然淘之汰之，十無一二，敢比披沙見寶，粗勝毀瓦畫墁，遂勒成桂苑集二十卷。臣適當亂離，寓食戎幕，所謂饘於是，粥於是，輒以筆耕爲目，仍以王韶之語，前事可憑，雖則僂僂言歸，有慚鳬雀，既壑既耨，用破情田。自惜微勞，冀達聖鑒。

這段自序清楚地總結了他遊幕淮南時期繁忙的筆墨生活。崔致遠溧水縣尉任滿後，於廣

明元年（八八〇）底轉入淮南節度使高駢幕府，被高駢辟爲從事，先後特賜署充館驛巡官和都統巡官，頗受高駢的信任，作爲文職幕僚，他代高駢撰寫了大量的幕府文牘，淮南軍府中許多重要的表狀書啓多出其手，居幕四年，公私之作累計「萬有餘首」。但當他返國後編輯別集時，却對其進行了認真的取捨刪汰，經過去蕪存精，最終棄其大半，彙編爲二十卷詩文別集。集中自設體類，分卷立目，目連正文，卷一與卷二收表二十首，卷三收狀十首，卷四與卷五收奏狀二十首，卷六收堂狀十首，卷七至卷十收別紙八十首，卷十一收檄書四首，書六首，卷十二收委曲二十首，卷十三與卷十四收舉牒五十首（含行墨敕牒詞五首），卷十五收齋詞十五首，卷十六收祭文四首，書二首，記二首，疏二首，卷十七收啓四首，狀六首，七言紀德詩三十首，卷十八收狀二十二首，啓三首，卷十九收狀一首，別紙九首，雜書十首，卷二十收啓一首，狀三首，別紙五首，祭文一首，詩三十首，共收文三百一十篇，詩六十首。其中，前十七卷乃爲幕府公文，後三卷多爲崔氏書信酬答之作。別集編就後，又另作一序附於集前，題「都統巡官侍御史內供奉崔致遠撰」，隨後他將留唐時期所著「雜詩賦及表奏集二十八卷」分編爲「私試今體賦五首一卷、五言七言今體詩共一百首一卷、雜詩賦共三十首

一卷、中山覆簣集一部五卷、桂苑筆耕集一部二十卷」，於光啓二年正月將所編詩文集呈獻與新羅第四十八代憲康王金景，希望借此獲得國主的賞識與重用。但本年所獻二十八卷文集，唯有桂苑筆耕集二十卷傳世，其餘八卷皆散佚無傳。

崔氏在序末注明此集呈進時間乃「中和六年正月日」，但唐僖宗中和五年（八八五）已改元爲光啓元年，崔氏於前一年秋離別唐境，不知改元之事，故於光啓二年正月呈進時仍沿稱中和六年，朝鮮徐有榘校印桂苑筆耕集序謂：「桂苑筆耕集二十卷，新羅孤雲崔公在唐淮南幕府時公私應酬之作。而東還以後，手編表進於朝者也。……又按中和紀年止於四年，而公進表年月繫以中和六年，蓋公以中和四年十月浮海，翌年春始抵國，又翌年編進是集。而前一年之改元光啓，容或未聞知也。」由此可知，桂苑筆耕集乃是崔氏歸國後於光啓二年（八八六）手編呈進的詩文別集。

二、桂苑筆耕集的流傳過程

桂苑筆耕集自光啓二年編就後，在高麗、朝鮮兩代皆很少流傳。朝鮮崇祿大夫議政府

左議政洪奭周（一七七四—一八四二，字成伯，號淵泉，正祖乙卯科及第，官至左相。有淵泉集和鶴崗散筆）曾這樣描述：

崔公之書傳於後者，唯桂苑筆耕與中山覆簣集二部，是二書者，亦吾東方文章之本始也，吾東方以文為尚，至我朝益煥以融，家燕許而戶曹劉，以詩若文成集者，無慮充棟宇矣，而顧鮮有知崔公之書者。余嘗見近代人所撰東國書目，有載中山覆簣集者，遍求之，終不可得，唯桂苑筆耕二十卷為吾家先世舊藏，自童幼時知珍而玩之，然間以語人，雖博雅能文而好古者，亦皆言未曾見，然則是書也，幾乎絕矣。（校印桂苑筆耕集序）

朝鮮後期實學家朴趾源（一七三七—一八〇五）在熱河日記卷四口外異聞中亦云：

唐書藝文志有新羅崔致遠桂苑筆耕集四卷（按：當作二十卷），而後來著書家引用書目無見焉，書亡當久。

這種狀況的出現，主要有三種原因：

其一，原集流傳受到戰亂的影響。崔氏歸國後，正值新羅行將衰亡之際，國內朝綱紊

亂，盜賊蜂起，兵燹不息，崔氏在代真聖女王所作讓位表中曾如是描述：「所管九州，仍標百郡，皆遭寇火，若見劫灰。加復殺人如麻，曝骨如莽，滄海之橫流日盛，昆崗之猛焰風顛。致使仁鄉，變爲疵國。」在代孝恭王所撰謝嗣位表中又稱：「當國大饑頻致，小盜相尋……今也郡邑遍爲賊窟，山川皆是戰場。」（孤雲先生文集卷一）這種社會局面必然會給文化典籍的傳播帶來很大的衝擊與限制，桂苑筆耕集的流傳自然也會深受影響，朝鮮仁祖朝詩人洪萬宗便以爲此集罕見流傳的原因，即在於「屢經兵燹，傳者絕少」（小華詩評）。

其二，原集文風不合時尚。新羅、高麗及朝鮮時期皆雅好儒家典籍與韓柳之文，形成文尚秦漢，詩宗盛唐的社會文化風尚，士人對古文與所謂「時語」（四六駢文）有着較嚴格的區分和鮮明的褒貶傾向，質樸平易的古文受到世人的歡迎，而繁縟摘藻的駢文則難以通行。崔致遠負笈來華後，主要生活於唐末之世，唐末文尚駢儷，風格華靡，幕府公牒尤爲如此，崔氏自然深受浸潤。桂苑筆耕集所收公私文翰，多以四六駢體寫就，很講究麗辭、事典及偶對，讀解較爲困難，因而在該國遂被評爲綺麗不古而受到冷落，朝鮮弘文館及藝文館提學徐居正（一四二〇—一四八八）在筆苑雜記卷一中便認爲：「今桂苑筆耕多有不解處，

恐當時氣習如此，或東方文體未能如古也。」韓國中央圖書館藏本，第五頁）我們還可從韓邦有關學者的評述中，反觀世人對該集的臧否態度，如洪奭周曰：「世或謂公文皆駢儷四六，殊不類古作者，公之人中國在唐懿、僖之際，中國之文方專事駢儷，風會所趨，固有不得而免者。」（校印桂苑筆耕集序）韓國近代學者崔國述在孤雲先生文集編輯序中認為：「世或以綺麗短先生，撰佛詆先生，然晚唐文法自有定制，凡百需用，非四六則不得行，此其所以不可不從也。……讀之者亦當想其時而見其志，不可泥於言而疑其非古也。」這無疑透露了原集流傳不廣的社會文化原因。

其三，原集流傳受到印刷條件的限制。唐五代之際，印刷術雖已傳入朝鮮半島，但主要用於刻印佛經及儒家典籍，很少刻印文人的詩文別集，宋葉夢得石林燕語卷八曾云：「唐以前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書爲貴，不多有。」作爲李唐屏藩國的新羅，情況大致相同。桂苑筆耕集乃崔氏手編而成，長期以抄本傳世，流傳範圍十分有限，徐有榘即稱「唯是集屢經鋟印板刻，舊佚拓本亦絕罕」（校印桂苑筆耕集序），說明高麗時期雖曾槧刻此集，但所得搨本數量極少，僅少數世宦之家偶有珍藏，世人難以見到，這無疑會限

制原集的廣泛流傳。

因崔氏原集瀕於湮沒散佚，該國有識之士深感擔憂，洪奭周稱此集爲「不絕如綫之文獻耳」，認爲：「使是書不行於東方，是玄酒不設於太室，而疏布不幕於犧罇也，豈所以教民不忘本哉！」（校印桂苑筆耕集序）徐有渠亦歎曰：「嗟乎，名醢之坊，必題杜康；良劍之鐔，必標歐冶。爲其不忘本始也。我東詩文集之只今傳者，不得不以是集爲開山鼻祖，是亦東方藝苑之本始也，庸詎可一任其銷沉殘滅而不之圖哉！」（校印桂苑筆耕集序）因而皆有意於拯救此集，使之重現並廣傳於世。

朝鮮純祖三十四年（一八三四，清道光十四年），時任湖南（全羅道）觀察使的徐有渠巡察本道，拜謁武城書院，憑弔崔氏遺迹，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議政洪奭周認爲徐氏乃「博雅能文而好古者也」，遂以先世家藏珍本見示，希望將此集重印行世。徐有渠偶得珍本，「如獲拱璧，懼其愈遠而愈佚也」，乃「亟取而校之」，又傾其財俸，用聚珍活字排印了該集，將其分藏於韓國泰仁縣武城書院及陝川郡伽倻寺內。此次排印雖然僅「得數十百本」，却使此集得以一綫相傳，不絕於世，成爲後人重印的重要藍本，韓國成大慶編崔文昌